中共党史若干著作研究

王学勤摇著

北摇京摇出摇版摇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摇图书在版编目 （悦阅读）数据

摇中共党史若干著作研究 辕王学勤著援—北京：北京出版社，圆猿员员援

摇ISBN 猿苑缘原园员园原猿缘缘园原员

摇Ⅰ圆中… 圆王… 摇Ⅱ圆王… 摇Ⅲ圆中国共产党 原党史 原著作 研究摇Ⅳ圆阅读…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阅读数据核字 （圆园员猿）第 园苑员缘猿园号

中共党史若干著作研究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王学勤 摇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远号）

邮政编码：员园园园园员

网 址：…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

愿责印员员援缘 米摇猿员千字

圆园员猿年 员月第 员版 摇圆园员猿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ISBN 猿苑缘原园员园原缘缘园原员

阅·猿园员猿 摇定价：员园园园元

目摇摇录

序一…… 张静如（员）
序二…… 张静如（圆）

绪论摇党史史著研究是党史学史研究的基础…… （员）
第一章摇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研究 …… （员圆
摇第一节摇释题及报告时间的判定…… （员圆
摇第二节摇关于五四运动…… （员愿
摇第三节摇关于中共创立…… （圆圆
摇第四节摇关于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 …… （圆苑
摇第五节摇关于中共“三大”和第一次扩大执委会 … （猿员
摇第六节摇关于中共“四大” …… （猿苑
摇第七节摇关于五卅运动和第二次扩大会议…… （源圆
摇第八节摇关于报告的尾声及报告结束日期的推断…… （源源
第二章摇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和《论陈独秀主义》
研究…… （源苑
摇第一节摇《党的机会主义史》成文时间考证 …… （源苑
摇第二节摇所谓“供发展党内讨论之一助”辨析 …… （缘圆
摇第三节摇《机会主义史》的史与论 …… （缘缘
摇第四节摇《论陈独秀主义》简评 …… （远苑

员

摇第五节摇对蔡和森三篇著作的一点比较…… (苑原
第三章摇李立三《党史报告》研究 …… (苑怒
摇第一节摇《党史报告》史事考评 …… (原园
摇第二节摇《党史报告》史论诠释 …… (原原
摇第三节摇《党史报告》历史分期之得失及与蔡和森
著作之比较…… (怨猿
第四章摇华岗《员源圆缘—员怨圆苑中国大革命史》研究 …… (怨怨
摇第一节摇《大革命史》编著体裁辨 …… (员园园
摇第二节摇《大革命史》史学价值析 …… (员园源
摇第三节摇《大革命史》历史地位评 …… (员员员
第五章摇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研究 …… (员园缘
摇第一节摇《革命运动史》编写参考读物考评 …… (员园远
摇第二节摇《革命运动史》与员怨猿源年讲稿之比较 …… (员猿猿
摇第三节摇《革命运动史》若干史论得失浅释 …… (员猿园
摇第四节摇《革命运动史》历史地位小议 …… (员猿缘
第六章摇陈伯达中共党史著述研究…… (员远园
摇第一节摇历史事件与思想学说：研究中共党史的门径
…… (员远园
摇第二节摇近代经济史研究：研究中共党史的基石…… (员苑员
摇第三节摇毛泽东思想研究：研究中共党史的主线…… (员苑源
摇第四节摇几点初步的归纳…… (员愿员
第七章摇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研究 …… (员怨源
摇第一节摇划时期的标志…… (员怨缘
摇第二节摇修订的启示…… (圆园园
摇第三节摇对党史学发展的影响…… (圆园员

主要参考文献…… (圆员愿
后记…… (圆园园

序摇摇一

作者，余之博士生，毕业已两载。攻博期间，力学笃行，成绩粲然可观。所撰论文，答辩时评价较高。经修改，遂成此书，可谓更上一竿。史家与史著评论，史学史之基础。往昔，系统研究甚少，此书之成，略补不足。作者非章句之徒，不安于一隅，力求进取，故书中多有创见，可供同行参考。

书中，对《中共党史学史》有所批评。此事，不足为怪。学术无批评，岂能进步。此风气，应极力提倡。余之弟子直言不讳，为学术批评添彩，亦为师者之幸。

寥寥数言，不成体统，权为序。

张静如

员源年 源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序摇摇二

这本书在 员怨怨缘年已经弄得差不多了，稍加整理即可出版。不巧，学勤的工作有了调动，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当副部长，这种工作实在太忙了，出书的事只好暂时搁下。不料，一放就是 愿年。近来，他的工作又有变动，忙劲儿缓了一些。所以，我劝他抓紧时间，把书稿整理一下，不要再拖了。他听了我的劝告，重新加了工，准备出版。我把书稿翻了一下，觉得还可以，不但并不陈旧，而且由于以往很少有人在这方面研究，仍感觉挺新鲜。学勤要我重新写一篇序。我把 员怨怨缘年初写的短序看了一下，自认为还有点特色，可以保留。但由于时间拖得很长了，学科本身有了很大发展，需要把有的问题交代一下，所以再补上一篇序。

圆园世纪 愿园年代是中共党史学迅猛发展的时期，到 怨园年代初期这种势头就逐渐缓了下来。原因是复杂的，而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对基础学科的影响。中共党史学属基础学科，自然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中共党史学仍在平稳发展。怨园年代，发表了很多文章，出了许多书。特别是由于中共党史学具有纪念史学的性质，故每逢事件、人物纪念日，出书的量相当可观。比如，《刘少奇百周年纪念——全国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就收录了纪念和研究刘少奇的文章 员愿愿篇。怨园年代最引人瞩目的是，愿卷本 《毛泽东文集》 的出版、员缘卷本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的出齐，和 《邓小平文选》

第 猿卷的出版，这对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员愿卷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圆园卷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出齐，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根据。再有，《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等重要研究成果，也都是在 怨园年代完成的。

中共党史学产生于 圆园世纪 圆园年代，现在 圆园世纪过去了，应该对中共党史学发展状况有一个概括性的总体评价。换句话说，中共党史学发展到 圆园世纪末，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应该有一个恰当的说法。我在《中共党史研究》圆园园园年第 员期发表的《中共党史学与 圆园世纪》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经过 五园多年发展的中共党史学，今天应给它一个什么样的总体估价呢？概括地说，就是以大量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比较丰满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体系。"任何学科都应该有一个研究体系，这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在许多老的学科里，建立学科研究体系的问题，早都解决了。但是，对于年轻的中共党史学来说，却长期处于研究体系不完善的状态。今天，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我在文章中，进一步说明这一研究体系是由下列 愿个方面构成的：通史类、断代史类、专史类、地区史类、行业史类、人物志类、研究性回忆录类、基础理论类。当然，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这一研究体系还会不断完善。不过，对现状，研究者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共党史学的发展。

党史学家和党史学著作评论，属于中共党史学研究体系中的基础理论类。中共党史学要发展，没有大量的、科学的党史学家和党史学著作的评论，是不行的。现在，许多书评大都是只说好，不说问题，即使说上一两句，也是抽象的。这是个老问题了，看起来不那么容易解决。说穿了，就是怕得罪人。其

实，谁也知道没有十全十美的著作，何况对一个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实事求是评论还是应该努力去做，能做多少做多少，做就比不做强。本书的优点之一，就是努力根据自己的水平，根据自己的认识，对史著做出评论。当然，这种评论是否恰当，可以研究和讨论，别人也可做评论的评论。这样，学科才能发展。本书作者的这种精神，值得赞扬。

党史学家和党史学著作评论的重点，在于评论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因为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的评论和总结，对学科发展有重要作用。研究者在研究中，往往对用什么样的思想和方法并不那么自觉。总结和评论某位史家和某种史著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可以使大多数研究者提高认识，在研究中以正确的思想和方法为指导，从而提高研究水平，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有个毛病是没有单独列出来进行研究，而是放在其他问题中讲到，这样就显得不够突出，从而效果也就受到影响。现在也不好改了，只能留到以后再说。

我觉得，学勤这本书对中共党史学的发展，还是很有用的。研究者可从书中引用的材料、进行的考证、深入的分析中得知，本书所研究的几本著作有什么优点、独到之处以及存在些什么问题，从而吸取长处，并不再犯同类错误，使新的研究有更高质量。为此，我愿意把它推荐给党史研究工作者。

张静如

[illegible]年 远月

源

绪摇论

党史史著研究是党史学史研究的基础

中共党史学史是 愿园年代以来中共党史学研究领域中新兴的一门学科。有关党史学史的意义、地位和作用，已为党史界所重视，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和论著。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员怨怨园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学史》和湖南出版社 员怨怨员年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是较早且较有分量的党史学史专著。但这门学科目前正处在初建时期，或称之为初始阶段。党史学史的现状如何？怎样才能进一步地发展？凡是关心这门学科建设的，都不时思考这样的问题。坦率地说，党史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俱有；提高党史学史的研究水平，首先必须加强党史史著的研究。这是笔者的研究心得，也是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

一、党史学史研究的困境

用“困境”来概括并非危言耸听。这里所说的困境，主要是指研究中的困境和党史学史的困境。确切地说，前者属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或存在的问题，后者则是不以研究者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历史的局限。

（一）研究的困境。《中共党史学史》“导论”明确界定了党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与党史学发生和发展过程有关的一切方面。但是，在这样宽泛的研究范围内，目前所能见到的

仍然仅仅只有党史史著的评介。史学思想、史学流派的探讨寥寥无几，且常常有牵强附会之嫌。党史学史中历史哲学、历史编纂学、史学方法论的思考与概括更难寻觅。这样的研究现状，称之为“窄”，丝毫不过分。而就已有的党史史著研究看，臆断、评述不当等现象较突出，称之为“粗”与“浅”，也是恰如其分的。前一个问题与党史学史初始阶段研究人员缺乏、研究方法生疏，又无先例可鉴有关。但后一种现象完全是已经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同志努力不够、研究不足造成的，应该说，这本来是可以避免或减少到最低限度的。

以《中共党史学史》为例，该书第一章第一部分认为，中共党史早期著作都是“没有抄袭”，“很少有套话”，“很少有雷同之处”的“独断之学”（第 页）。考察实际并非如此。蔡和森对早期中共党史学的贡献自不待言，但从《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至《论陈独秀主义》，表现出一种“历史的方法”的滑坡，与独断之学相距甚远。李立三的《党史报告》通篇没有完整准确的史实基础，惟一自成体系的只是把中共“二大”后的全部历史贯以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独断。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的编写体例自具风格，但其中有严重的抄袭倾向。

由于没有仔细地研读史著及其成形时的相关史料而造成的评述不当或论断牵强，在另一部党史学史著作《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也出现多处。如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当在 月 日以前结束”（第 页），忽略了该报告最后多次提到的 年三四月间发生的“国民军失败”一事；第 页摘引华岗《中国大革命史》中的一段文字后，称华岗“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指导”，却没发现这段

话原出自王明《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文[①]；第 员猿园页以广州起义的七个小节标题为例，论述华岗《中国大革命史》严谨的结构体系，誉之“简直滴水不漏”，实际上这一结构源于 员怨猿员年 员月 猿日中共中央议决案《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改动甚微。至于第 员怨园页摘引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所引述的广州起义时苏维埃政府的条文，疏忽了核对原文献，以致误抄了“照原藉（应为“薪”）津贴失业工人”和“贫民的物质（应为“质物”，与“当铺”相连）无价发还”。此种以讹传讹现象，在党史学史研究著作中出现，是很不应该的。

类似的问题在某些单篇论文中亦有发现。如《华岗与〈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员怨怨猿年第 猿期）一文结尾处，对华岗抄自瞿秋白的结论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评价。

由于早期党史著作的开拓性与权威性，非专门研究党史学史的党史工作者常常作为文献典籍加以征引，而对其中史料史实史论中存在的种种疏误、偏颇也往往照引不误，对党史研究造成新的、不应有的困扰。党史学史研究者应把纠正这类疏漏谬误作为最基本的工作起始。

（二）党史学史本身的“贫乏”。这是造成党史学史困境的客观原因。这种贫乏，与上述研究的贫乏同时并存，但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联系。所说贫乏，是相对中国古代、近现代史学而言的。在相对有限的党史学史（集中体现在屈指可数的党史史著）上做文章，无疑是越做越难，越做越窄。从《中共党史学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各个阶段党史史著的

① 《王明言论选辑》第 源缘园页，人民出版社 员怨怨园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研究篇幅、程度、分量来看，十分突出的事实是，早期的党史史著远比后期的党史史著更耐人咀嚼。《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 [illegible]年至 [illegible]年部分涉及党史、革命史著作仅 [illegible]篇，占全书 [illegible]还多的篇幅，而 [illegible]年至 [illegible]年包括专题研究著作在内，罗列了数百篇，却只占全书不到 [illegible]的篇幅，大量的著作流于内容简介，或者一笔带过。这种头重尾轻的现象，是受制于党史学史自身演进规律的必然结果。随着党史史著编撰体例、内容取舍、行文要求以及中心思想的明显完善和逐渐规范，党史通史类史著越来越整齐划一，至多内容简繁、文献征引多寡略有不同，或者就是随“路线斗争”的变化，一些人物、事件的评价提法有所不同。独断之学、一家之言等等已经难以在这样的党史史著中得以表现。

党史专题类研究著作主要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产品。虽然数量可观，各具特色，但上乘之作仍为少数。要研究党史史著作者的史学思想，仍然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党史史著作者们在撰述其著作时，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说史著（教科书例外）中的这些看法就是他个人的真实的想法。《中国大革命史》因抄录文献量多，许多文献中表现出“左”或右的思想倾向不一，因此曾被瞿秋白指责为“偷运”机会主义的“私货”①，数十年后仍被认为是华岗当时的思想局限②，或是对“左”、右倾思想都进行了批判③。党史史著本身的有限与贫乏，制约着党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二、党史学史研究的出路

① 瞿秋白（署名范亢）：《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布尔塞维克》第 [illegible]卷第 [illegible]期，[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

② 廖盖隆：《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文史资料出版社 [illegible]年版。

③ 《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第 [illegible]页，湖南出版社 [illegible]年版。

源

首先，加强党史史著的研究方法的研究，逐步建立党史史著以至党史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毫无疑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由此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是推动党史史著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指南。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还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只有世界观正确，方法上又得当，并在研究实践中不断探索的人，才能达到党史史著研究的较高境界。关于党史研究和评论的方法，《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学概论》已经涉及。但党史史著及党史学史的研究方法，至今还没有专门的论著。

笔者认为，党史史著研评应着重从党史著作所涉及的史实及其取材范围、叙述方法和手段、结构安排、论证水平、历史渊源、学术影响、指导思想等内容和形式两个有机结合的方面进行，克服长期以来偏重思想内容的分析，而忽视结构形式的探究，或至多将形式特点作为大量内容分析后的“扫尾工程”的倾向。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是党史史著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此外，还要了解史著编著者的生平，研究其著作写作、修改时的背景，研究其著作中出现的各种事件、人物、学说及其相应的评价的来龙去脉。只有通过立体的、综合的、整体性的、多角度的研究，才能尽可能真实地揭示出该史著中所包含的主观逻辑与客观历史的一致程度。只有这样，党史史著研究才能摆脱仅仅复述原作品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等浅薄的表达形象，从而改变党史史评与“评介”为伍，且渐渐沦为书讯或广告的现状。

运用科学的方法探讨党史史著的弱点和失误，剖析其成因，应该成为党史史著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往那种只看到每部史著的开拓性、完美性，而对其不足与缺陷，仅仅以“白璧微瑕”，“不能苛求前人”等一带而过的评述方法，是难以促进党史学史更快地发展的。

实事求是是党史史著研究最基本、最首要的原则。但是，只有在研究中自觉地充分注意到上述这些问题，实事求是才能得以体现，否则难以做到。如《中共党史学史》第 猿源页和 猿缘页，《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第 猿缘页充分证明蔡和森史著中的实事求是之处，本身并不实事求是。因为蔡和森批评国共合作之初中共路线的右倾，完全是根据员怨圆缘年缘月中央第一次扩大执委会的决议作出的客观叙述，是有共产国际指示为依托的，不存在需要多大勇气的问题；《党的机会主义史》成文时期，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数次邀陈独秀赴苏出席中共“六大”，不存在“越陷越深”问题。显然，党史史著研究中的实事求是，不是以现在的眼光、标准去看历史，而应是从已经过去的历史的某一点（即史著形成时）再看过去。只有准确完整地把握史著形成时的历史背景，研究时富有历史感，评价才不失之于偏颇或“苛求”。

史著研究包括描述、阐释或判断。阐释主要帮助读者清除史著因历史等原因而造成的阅读上的障碍，增加对史著及其价值的理解程度，如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因现存的仅是报告的记录稿，其成文时间、引证文献、史论来源等等都没有明确说明；又如《党的机会主义史》由于现在所见的报告是经整理才形成的，因而阐释其整理时增加的具体内容，对判断其准确的成文时间，客观公正地评析其史论价值等，都是必要的研究步骤。

史著研究更多的是创造，是开拓一种新的研究体系。创造过程中所运用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它的适用范围。诸如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的校勘、考据、版本研究等，都可在党史史著（尤其是早期党史史著）中加以应用。通过校勘，可以发现《中国大革命史》编写的主要资料来源及编写手段和技

巧，从而判明所谓“感情真挚而热烈”，“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① 的历史描述的原作者是施英；所谓“一直被延续使用，有的则已成为公论”②的看法和论断，本出自中共中央决议或瞿秋白等人的著作；所谓“最有价值的部分”③，并不都是华岗的思想。通过校勘，可发现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转引《中国大革命史》中史料带来的误字、脱字及不确之处。这些疏误甚至在多次重版校订后仍大量存在。通过考证，可以确定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的成文时间是 员怨圆苑年春，而不是 员怨圆缘年 缘月或 员怨圆怨年，从而准确地评析文中批判陈独秀主义的理论意义和历史背景。通过版本研究，则能对《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与 员怨源苑年《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异同、得失，员怨愿员年版修订的主要方式和指导思想等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从而明确 员怨愿愿年版在党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次，完善党史学史的研究体系和编纂体例，加速辅助性研究学科的建设。现有的党史学史著作，由于条块分割严重，显得支离破碎，与史学史的有机构造要求相距甚远。或重新修订，或另起炉灶，但无论怎样，都首先必须参照传统史学史的模式，制定出党史学史的编纂体例和研究体系。这一体例和体系当然要适合党史学史自身的客观条件和现有规模。如前所述，党史史著作者的史学思想，与传统史著作者相比，是相对贫乏的。目前所能概括出的许多史学思想，严格地说，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然是政治思想或哲学思想。既然如此，就不应生搬硬套，滥竽充数，而应扬长避短。如党史学史中某个作者的史

①②摇《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的创立和发展》，《学习与研究》员怨愿圆年第 员期。

③ 廖盖隆：《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

学思想较为贫乏，但某个作者群，某个研究团体的史学倾向十分鲜明。如延安时期重新学习、编修党史的尝试，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学习党史的热潮，“文革”时期的十次路线斗争史倾向，近年来的党史、革命史教科书、辞书的编写现象等，或作为思潮，或作为流派，都是十分丰富的史学史内容。只有通过大量的史料钩沉、收集、整理，通过前后因果关系的历史比较，通过对社会背景、历史背景的纵横思考，去假存真，才能揭示其中的规律和历史的真实面貌。一部党史学史，本身首先应该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的党史学著作。

当然，相对贫乏毕竟是客观存在。党史学史的研究即使在很好地解决了上面所说的问题以后，也仍然可能因此而面临困境。所以，在全面深入地研究党史学史的同时，应及早在党史文献学、党史目录学、版本学、注释学、编纂学等相关的辅助性门类方面实行配套性综合研究。互相补充才能相得益彰。综合配套同步研究，拓宽党史学史的研究路子，使党史学史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不断地得到来自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的补充和营养，同时，也能保证党史学科建设的完整性。至于文献学、目录学的建立，同样需要统筹协调，可扬弃中国传统史学中相应学科门类的编纂体系与体例，研制出适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共党史学特点的撰写方法。延安时期编辑的《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部大型档案文献集的文献学、目录学方面的意义、特点、影响，至今还未得到研究者的阐释。近些年来，中央档案馆编出的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集，更为党史文献学的创立提供了条件，但这项研究工作还未展开。

近年来，大批地方党的组织史、财经史、根据地史等原始档案史料得以整理公布。但是，在整齐崭新大量的文献面前，地方党史研究显得薄弱。地方党史作为党史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引起党史学史研究者的足够的重视。这方面已经开始

的工作，也应该快马加鞭。

党史文学近几年越发显出生机。它以党史内容（人物与事件等）为题材，以文学的形象思维方式再现历史的画卷。与党史专题研究著作相比，党史文学作品销售量之大，阅读者之众，影响面之广，且有增无减，应该成为党史学史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或与古代史学文学作比较，或与五六十年代大量的党史回忆录（可见于《红旗飘飘》）求异同，探究其发展情况，评析其叙论得失，这无论对党史学史的编撰，还是党史学的发展，都能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在今天看，党史文学无疑是注入党史学的一股清泉。它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政治史内容，世态、心态有机的结合，是一般通史类、专题类党史著作所不可或尚未企及的。它自觉地以文学形式干预甚至干扰党史学界的勇气，迫使党史工作者对此刮目相看。至于其他诸如回忆录、口述史学中的不确与文学虚构的区别，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言论的史源及权威性等问题，也都应成为党史学史有关章节探讨的对象。

总之，党史学史研究应挖掘其内涵与开拓其范围同时并举。而最首要的是确立科学的编纂体系和体例。

最后，充分认识党史学史的特殊性，逐步增强史的意识。党史学史是历史科学的分支。其史的特点、史的脉络、史的框架、史的征象比党史学更为清晰。但是，近年来对党史学科性质认识方面的分歧，并没完全消除。党史学史研究同党史学研究一样，时时处处都感受到根源于学科性质的制约。这与该学科和现实政治联系紧密的特殊属性有关。

从总体上说，党史史著所叙述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推动的现代革命斗争史，其中许多内容还没完全凝固，有些本身还在发展和延续。因此，虽然研究考察的时间与其成形的时间间隔较短，但却不容易一下子完整、准确地把握其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